

# 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sup>\*</sup>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报告了在实践中凝练的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五个要素:1)国家与社会要求;2)外语教材文化范畴;3)外语教与学的理论;4)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5)编写管理规范。“国家与社会要求”是外语教材编写的指南针。“外语教材文化范畴”是落实“国家与社会要求”“外语教与学的理论”和“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的内容载体。“外语教与学的理论”是设计教材语言实践活动类型、内容和顺序的依据。“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是选择教材内容和设置育人目标的理据之一。“编写管理规范”是落实前面四个要素的必要保障。每个要素有自身特点,但又互相关联。从初始操作程序上看,它们有先后顺序,但在编写过程中,这五个要素须协同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外语教材编写的高质量。

**关键词:**大学外语;大学英语;外语教材;教材编写;大学英语教材

##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pil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WEN Qiufa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ports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pil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generalized from my practical experiences. The system comprises of five major elements: 1) national and social requirements; 2) categories of cultures included in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3) theori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4)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growth; 5) management of compil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The first element concerns with the direction for the other elements. The second element may decide the types of cultures included in textbooks which must be aligned with the first, the third and fourth elements. The third element centers on the rationale for designing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rranging them in order. The fourth element may provide the reasons why some themes are chosen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re set up. The last element is related to the assurance of translating the above four elements into practice. These five elements each have their unique feat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se five elements are put into practice in order. Once the cycle of compil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starts, these five elements must work together. Only their joint force can ensure the high qua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sup>\*</sup> 张虹教授、邱琳副教授、张文娟副教授和孙曼副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刘雪卉博士帮助校对和整理了文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Key words:**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s produc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管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教材的议题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新时代以来,教材的重要性从课程论范畴提升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意识形态安全高度。教材不仅是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关注的重点工作,也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高质量教材建设应以高质量研究为基础,但目前教材研究队伍规模小、研究成果零散且影响力弱。外语教材更是如此。目前有关外语教材编写体系的构建研究寥寥无几。唐磊(2000)曾撰写“外语教材编制理论初探”,在理论层面探讨了中小学教材编制,但不具备实操性。庄智象在《外语界》发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和评价体系”一文,深刻分析了我国外语教材编写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重实践、轻理论”“盲目照搬、照抄国外的模式和方法,缺乏国情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呼吁教材编写者要“从实践出发,孜孜以求,积极努力探索和总结高校英语教材编写的实践,使之上升为理论,构建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2016:50-51)。他还指出,目前我国有关外语教材编写理论存在两个明显问题。第一,有些人认为编写教材无需理论,他们按照前人的模板,寻找新选篇,基于新选篇编写新练习,就能完成任务。换句话说,他们“抄袭”了前人所编教材的体系和练习类型。第二,有些人长期从事教材编写,实践经验丰富,教材有特色,质量还不错,但无显性理论指导,这种无理论指导的实践,一方面可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他们的经验得不到传承。为了积极响应庄智象(2006)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材编写体系的呼吁,我动笔撰写此文。

作为总主编或主编,我编写过多套大学英语教材,例如《跨文化口语教程》(文秋芳 2005b)、《高级英语口语教程(上)》(文秋芳 2004)、《高级英语口语教程(下)》(文秋芳 2005a)、《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4册)》(Greenall、文秋芳 2009b)、《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1-4册)》(Greenall、文秋芳 2009a)、《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综合教程(1-4册)》(Greenall、文秋芳 2016b)、《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视听说教程(1-4册)》(Greenall、文秋芳 2016a)、《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王守仁、文秋芳 2015)、《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1-4册)》(文秋芳 2023)、《新标准职业英语》(文秋芳、杨华 2023)。在参与编写上述大学英语教材过程中,我不断思考和总结编写教材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下文报告的仅是初步凝练的结果,尚不成熟,拟在未来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优化。

## 2. 中国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解析

中国外语教材<sup>①</sup>编写体系涵盖五个要素(见下页图1),每个要素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又互相关联:1)国家与社会要求指政府颁布的相关文件对大学外语教材编写总体方向的指导;2)外语教材文化范畴指外语教材内容,是落实“国家与社会要求”“外语教与学的理论”“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的载体;3)外语教与学的理论指外语教材遵循的外语教与学的原则和理念,是设计教材语言实践活动类型和安排教学活动顺序的依据;4)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指学生成长的规律,是教材选择内容和设置育人目标的主要根据;5)编写管理规范指外语教材编写全过程监管的制度,既是对编

<sup>①</sup> 教材狭义指教科书,广义指用于教学的一切材料,即除教科书以外,还包括各种教学辅导材料(曾天山 2019),本文讨论仅限于教科书。外语教材仅限于通用英语教科书。

写过程的约束,又是落实前面四个要素的必要保障。从初始操作程序上看,它们有先有后,图1中用数字表示了顺序。一旦启动后,这五个要素须协同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外语教材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表述便利,下文逐一解释图1中的五个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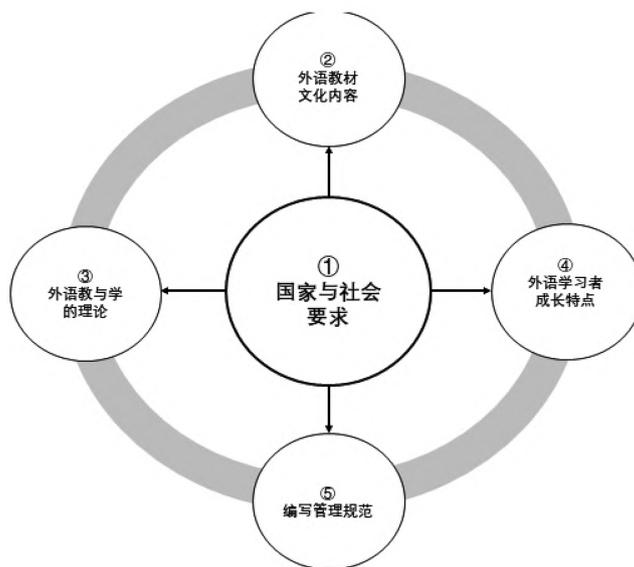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

## 2.1 国家与社会要求

国家与社会要求指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总体指导思想,具体包括党的教育方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和国家审查教材的基本指标。

党的教育方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有着根本性地位和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条规定: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党的教育方针明确了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根本遵循。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简称《指南(2020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是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5版)》(简称《指南(2015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修订的结果。它不仅融合了党中央和全社会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新要求,也汲取了以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经验教训。大学英语教材编写者须认真学习《指南(2020版)》精神,全面落实各方面的要求。与《指南(2015版)》相比,《指南(2020版)》在解释人文性时,增加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强调大学英语课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的能力,为中国文化传播服务;另一个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课程内容之中。这两个新增要点对教材编写提出了新要求。

国家审查教材的基本指标可作为衡量教材质量的准则。在我参加过的多批外语教材审查工作中遵循的主要指标有四个。第一是“思想性”,主要指教材内容与插图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第二是“科学性”,主要指教材与《指南(2020版)》的协同性,以及教材内容和插图的准确性、逻辑性和适宜性。第三是“系统性”,主要指教材体例前后的一致性、学段纵向衔接和学科横向配合。第四是“规范性”,主要指教材的编辑排版须符合国家要求。

简言之,“国家与社会要求”为教材编写者定向、把舵,教材编写团队一定要全面学习,深刻领会。作为总主编或主编,则应承担更大责任,应把党的教育方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和国家教材审查指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教材中的内容和插图一一把关,不能有丝毫疏忽。

## 2.2 外语教材文化范畴

### 2.2.1 对文化内涵的解释

外语教材文化范畴中的“文化”需要进一步解释。文化的定义林林总总,但适用于外语教材文化的解释比较鲜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02:9)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或某个社会团体拥有的精神、物质和情感的系列特征,还包括除艺术、文学外的生活风格、生存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观念”。这个解释比较适合于说明外语教材文化范畴。

依据文化的载体,教材文化可分为语言文化(languature)和非语言文化(non-languature)两类(Wen 2016)。语言文化<sup>②</sup>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非语言文化指用语言以外的其他手段为载体的文化。语言文化可进一步分为百科知识文化、交际情境文化、语言本体文化(Levelt 1989; Wen 2016)。非语言文化主要指教材中出现的图片、符号、录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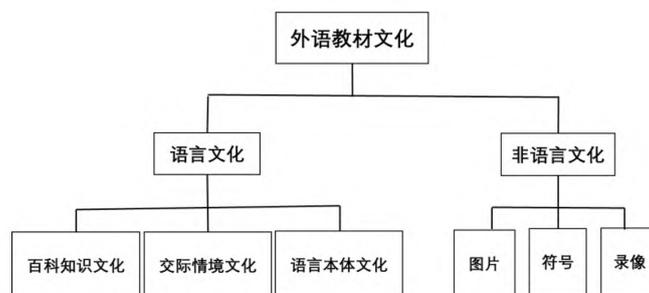


图2 外语教材文化范畴示意图

### 2.2.2 语言文化

百科知识文化指各国的国情、政情和社情知识,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观念和价值体系。百科知识文化是显性文化,需要有意识学习才能获得。在外语教育中,由于这种文化以外文为载体,因此这个层面的文化学习也是语言学习。从外语教材编写视角,具体内容包括目的语国家文化、学习者母语文化和其他文化。这种分类符合《指南(2020版)》的新要求,即要求大学外语课程既要教授外国文化,增强大学生对世界的了解,又要传播中华文化,形成双向交流互鉴。这一新要求正是遵循了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战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习近平 2022:63)。

就大学英语教材而言,目的语国家文化具体指说英语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等国家的国情、政情、社情和人情各方面的知识;学习者母语文化指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目的语国家文化指英语国家和中国以外的文化,例如法国、德国、日本、泰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巴西等。需要强调的是,大学英语课程不是某类国家的文化知识概况课。大学英语教材要在比较视角下,培养学生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对差异的宽容性(文秋芳 1999),让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但不自大,传播本国文化但不忽略学习其

<sup>②</sup> 在中文中,语言文化一般看作并列关系,本文中语言文化为英文合成词“languature”的翻译。

他国家文化的精华。

有关百科知识文化的处理,目前外语教材编写者面临着系列挑战,例如目的语国家文化、学习者母语文化和他国文化如何较好地呈现在教材中?三类文化的比例是什么?如何处理政治性强、价值导向明显的中外文化?如何处理宗教文化知识?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情境交际文化指何时、何地、对何人、用何种方式、讲何种话的规则。中外交际文化差异存在于多个层面。例如在语用层面,西方对长辈或老师可直呼其名,而中国更倾向长幼有序,中国英语学习者可在理解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行为。有的交际差异属于宗教习惯和文化习俗层面,中国外语学习者可“尊重、宽容”,但无需“接受”和“认同”。有的差异属于政治意识层面,例如对“人权”“民主”的认识,中外有差异,有人甚至对中国相关情况进行造谣污蔑。中国外语学习者对此不能轻易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做“沉默羔羊”,而是要有理有节,摆事实讲道理,说清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当然我们的观点也不必强迫对方接受。

目前外语教材中关涉情境交际文化时,往往将重点放在语用层面,大都是日常交际、生活习俗、观念等话题,一般回避政治议题。主要原因是,我国原来对意识形态性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外语教师难以把握如何让学生与异国交际者进行有效交流。新时代以来,这些概念都有了中国特色的解读。外语教材要及时将其纳入其中,例如,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其中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相互贯通的全链条民主。作为外语教材编写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既要在交际议题上覆盖不同层次,又要照顾交际对象多元化和交际场景多样化,这样才能培养学生获得灵活有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本体文化指内嵌在语言系统内的词、句、语篇内的文化。这是一种隐性文化,深藏在话语中。这种文化一般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性,是学习某种外语必须要学习的文化。如不掌握,可能造成交际障碍。为提高学习效率,在教材中可采用显性方式呈现,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本体文化的意识。以句子层面文化为例。中文的流水句很常见,一个句子可描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而英文中不允许出现流水句。一般情况下,每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和谓语。再如语篇层面文化。中国学生要向教授请假时,通常先详细说明原因,最后提出请假要求;中国人向朋友借钱,一般先描述自己遇到的困难,然后再提出借钱一事。而英语本族语者的话语组织方式基本与中文本族语者相反,先说明请假或借钱的请求,然后再说明原因。这类差异适合显性教学,易于掌握。

### 2.2.3 非语言文化

外语教材中的非语言文化主要指教材中的插图。以前我们对插图都不太给予关注。自2022年,国家教材委员会组织了教材插图的全面审查。常出现的问题有三类。一是图片不符合大众审美观念,例如,动漫画扭曲了中国学生形象,学生的发型和穿衣不当。二是图片有思想性问题,例如,中国地图中台湾省的颜色与大陆不同,南海的九段线不准确;中国国旗尺寸不当、学生穿的衣服上印的是美国星条旗等;图片中的学生用枪对着别人,父母之间吵架等;出现外景图片时,外国的蓝天白云,中国的天空灰蒙蒙;出现食品图片时,外国的绿色有机、健康,中国的颜色灰暗、不健康。三是图文不配。作为外语教材主编,不仅要把握语言文化关,还要认真审查图片,确保非语言文化符合国家要求。

### 2.3 外语教与学的理论

“教”和“学”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必须互为呼应,“教”为“学”服务,“学”在“教”的专业指导下,能“学”得更好更快。鉴于“教”服务于“学”,因此“教”要遵循“学”的规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聚焦外语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之处,侧重的是“教”与“学”语言项目。换句话说,“立德树人”是各门课程要落实的共同任务,而教与学语言知识和技能是外语课程特定目标。如果忽略这个特定

目标,外语课程就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

### 2.3.1 外语“教”的理论

外语“教”的理论指服务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安排的原则或理念。外语教材主编一定要有清晰的理论框架或明确的理念。例如李筱菊在消化英国学者创建的交际理论基础上,根据我国外语教学实践的现状,改造所引进理论,带领团队边试验、边研究、边编写教材(文秋芳 2019)。她用本土化语言将“交际能力”定义为“有所知、有所会、有所能”。“有所知”就是要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功能知识,“有所会”就是要拥有听说读写译技能,“有所能”就是能够运用语言规则和功能知识,通过听说读写成功完成交际任务。她进一步解释了实行交际法的四条原则:1)要把学生置于尽可能真实的交际情景中;2)交际是一种活的过程;3)交际活动必须由学生本人去经历;4)语言形式的掌握必须见于交际当中(李筱菊 1984:18)。她将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实行交际法的原则落实到《交际英语教程》中(李筱菊 1987)。

再如《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和《新标准职业英语》依据的都是“产出导向法”理论。该理论经过 10 多年的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不断优化而成,主要克服的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用分离、文道割裂的诟病。这三套教程的单元结构根据产出导向法的“驱动-促成-评价”教学流程,突出产出导向、文道相融,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导向”既符合社会职场使用英语的真实情况,又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教材中设计的系列促成活动,为学生的产出搭建了完成产出任务的脚手架,评价学生产品时强调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这一理论融合了二语习得理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同时将育人融入用外语“做事”的实践,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2.3.2 外语“学”的理论

对外语学习的解读可能有多种。广义上可理解为既学习语言,又通过语言学习各种百科文化知识,提升综合素质。狭义上可理解为学习语言。这里仅局限于学习新语言,因为这是外语课程设立的特殊性。基于使用的语言学理论(usage-based linguistics)主张语言学习的目标是“固化”(entrenchment)新语言项目,即从程序化(routinization)到图式化(schematization)(见图 3)(Schmidt 2020)。所谓“程序化”指学习者能够自动化处理所学语言项目;所谓“图式化”指学习者对程序化内容进一步概括,使其抽象程度更高,具有更高迁移性。语言学习对象是联系模式(pattern of associations),具体包括音-形-义联系、组合联系、聚合联系、语用联系。这就意味着一个新语言项目的学习要覆盖多种联系。只有在使用中掌握了多种联系模式,学习者才能从程序化到图式化。语言学习方式指基于使用的重复,具体指重复要在感知、动觉、认知、社会活动中展开。换句话说,重复不是机械重复,而是在不同类型、不同模态的话语活动中进行重复。经过多次重复,才能达到程序化,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进入更高层次图式化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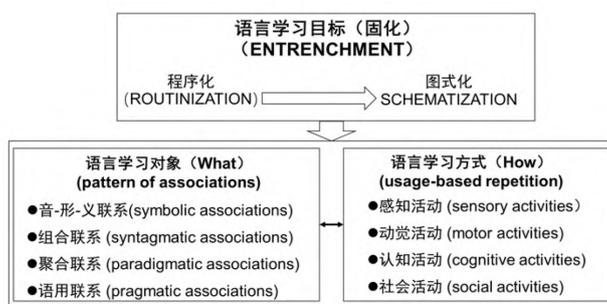


图 3 基于使用语言观的外语学习示意图

以前,外语教材过分重视孤立的词或短语学习或机械背诵课文,未基于使用设计多类型和多模态活动,因此,学生掌握的是“死”知识,不会“活”用。而当下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对语言学习本身不够重视,误以为学习“义”后,就能自动获得“形”。这个倾向在目前教材中主要体现为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学习对象的覆盖范围不够广,有的新语言项目连最为基础的音、形、义联系学习者都未掌握,更不要说其他联系模式,就要求学生参加交际活动。另一个是新语言项目的学习缺乏足够的有变化重复(varied repetition)和间隔性复现(spaced repetitions),误以为只要听过、看过一次,就能掌握新语言项目。

在我新近主编的教材中,我们就特别注意在“产出导向”的前提下,在促成活动中巧妙安排多样化的重复,同时注意在不同单元和不同册次之间的复现率,让学习者能够强化和巩固四种不同类型的联系模式,最终在大脑中能够达到“固化”程度。

#### 2.4 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

外语教材在工具性层面,为的是让教师教好外语,让学生学好外语;在人文性层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无论在哪个层面,外语教材编写者都要目中有“人”,要了解他们的认知水平、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更要了解他们的成长规律与特点。大学阶段是人生正确“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年级大学生正处于由少年晚期向青年期过渡(简称为青年过渡期),二至四年级大学生步入青年发展期(张劲 1995)。大学英语一般开设在一、二年级。如何将育人有机融入外语教材?这是当下外语教材编写者要解决的新问题。由于版面所限,本文以大学一年级学生为例,说明外语教材编写如何符合处于青年过渡期大一学生的特点。

大一学生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刚到学校,不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夏纪林 2005)。进大学前,一般学生都习惯于生活上依赖父母,学习上依赖老师。进入大学后,需要生活上独立,学习上自主。这一变化易使学生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针对这一特点,不少大学英语教材都在第一册第一单元安排有关适应大学生生活的主题。其中涉及如何料理个人日常生活,如何理财,如何应对大学学习压力产生的焦虑,如何结交朋友,如何参加社团活动等。输入材料介绍世界各国大一新生的情况,由此可让中国大学生了解到,从高中过渡到大学,不同国家的学生都会遇到类似问题,这是人生必须跨过的门槛。考虑到独立生活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教材编写者会将其贯穿于后续其他单元。

第二个特点是,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期待自己能在大学学到与高中不同的知识。为了满足学生这一需求,第一、二册的单元主题除了帮助学生克服孤立感和无助感外,教材内容一般都要超过高中的知识范畴。例如高中英语教材中有“heroes”这一主题,主要介绍英雄事迹。大学第一、二册虽有类似主题,但内容深度有了明显拓展。输入材料有中国英雄,也有西方人眼中的英雄,就此比较了英文“hero”和中文“英雄”内涵与外延的差别,有意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同时鼓励学生学习中国英雄的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个特点是,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二分对立思维比较普遍。进入大学前,他们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准备高考复习时,脑中只有对错之分,形成简单化思维模式,看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为了逐步改变学生的简单思维模式,大学英语第一、二册中安排的单元主题会呈现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在有关环境保护的主题中,高中英语教材一般简单呈现环境污染的事实,号召读者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动。而在新近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中,环保议题相关的单元内容已开始将讨论视角扩大到世界范围,说明为什么气候变化公约确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输入材料从历史角度分析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解释不能仅从当下碳排放量的多少来确定各国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从共时角度考察各国人均碳排放量的显著差异,

说明仅以国家总碳排放量来决定责任大小,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这就让大学生认识到,世界上很多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才能得到更公平的解决方案。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辩证思维能力外,外语教材还应该为大学生发展各种类型的高阶思维能力提供学习和训练机会。

## 2.5 编写管理规范

从教材管理的角度,外语教材编写涉及编写团队和编辑团队。教材质量取决于这两个团队(下文简称“双团队”)的协同度。总体说来,前面说到的四个要素都要通过第五个要素给予落实。图4展示了近年来我所经历的外语教材编写管理流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总体上说,双团队自始至终处于互动之中。我们以“精品为目标”,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下面分别说明双团队互动协同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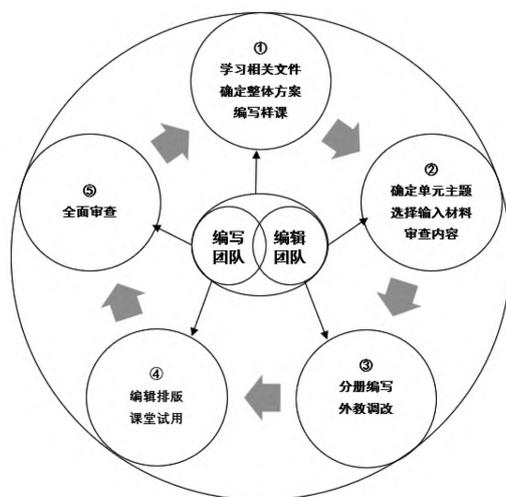


图4 编写管理过程示意图

第一阶段,双团队共同学习相关要求,制定整体方案,编写样课。具体地说,作为某套教材的总主编,要向双团队全体成员汇报自己对相关文件的思考,同时说明对本套教材特色的初步设想。例如,我提出新时代的外语教材一定要在传统培养目标中增加培养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中外文化的呈现一定要在比较视角下,外语教学要以“产出”为导向等。就我的发言,双团队开展讨论并提出问题,经充分发表意见后达成共识,才进入下一步工作。这是落实第一个要素的关键。制定整体编写方案由编辑团队拟定初稿,再由总主编与双团队共同讨论定稿。该方案一般包括教材定位、编写理念、整套教材构成等,其依据源于双团队对国家与社会的要求、外语教与学的理论、外语学习者成长特点这三个要素的理解。编写样课首先由第一册主编负责。这是最耗时费力的任务,但又最为重要。在撰写过程中,样课撰写者会不断与总主编和编辑团队沟通,各方基本满意后,开始课堂试教,再根据试教情况进行修改,最后交给双团队讨论确认。这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单元结构、教学流程、输入材料、教学活动类型等。如选择“产出导向法”为设计具体单元教学目标和教学流程的依据,单元内各部分必须遵照“产出导向法”的理念、假设和教学流程,其内部要逻辑自洽,环环相扣。同时教学活动类型要符合“学”的规律。如遵循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语言学习要覆盖各种联系模式,学习方式要体现基于使用的多样化重复。

第二阶段,确定单元主题、选择输入材料、审查内容的思想性和难易度,以及与版权相关的问题。本阶段任务始于各册书的单元主题列表,再由双团队讨论。确定单元主题时要考虑到外语学

习者成长特点,同时要考虑外语教材文化范畴的覆盖面。根据单元主题选择输入材料由各分册书主编和编者负责。选择材料特别要注意目标语国家文化、学习者母语文化和他国文化的适当比例,就学习者母语文化而言,要考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覆盖面。选择好的材料逐篇提交给本册主编与编辑团队审查,最后由总主编把关。这一步对确保所选材料能符合要求特别关键。如此时把关不好,到后期再发现问题,编者前期设计的各项教学活动可能会前功尽弃。

第三阶段,各册同步编写,语言质量由外教把关。编写时以单元为单位,每完成一个单元先由分册主编审读,再提交编辑团队审读,最后由总主编把关。按单元审读的优势在于,发现问题能及时得到纠正。为了保证语言质量,以册为单位交给外教调改生词率、句子难度、语言地道性。外教根据编辑团队标注的生词和句子难易度进行调整,语言地道性由外教整体把握。外教完成任务后,分册主编和编辑团队进行核查,确保调整恰当。

第四阶段,编辑排版。排版涉及版面的安排、字号的选择、颜色搭配、插图选用等。分册主编与编者先审订,再由总主编审定。如有问题总主编会联系分册主编和编辑团队。完成审定后,按单元分头邀请教师试用。因全册试用需要半年时间,以单元为单位则可缩短出版周期。正式出版后,双团队会选择部分院校进行全册试用,根据试用情况,对教材进行再修订。

第五阶段,通册审查。以第一册为例。编者先审读自己编写的单元,再交分册主编审读,与此同时分册编辑与总主编同步审读,最后进入三审三校。在整个三审三校过程中,双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确保送出版社质检时能够顺利通过。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不少外语教材编写缺乏全过程的双团队密切互动。一般情况下,编写团队先完成编写工作,编辑团队再做编辑工作。双团队联系不紧密,同时也缺乏规范流程。这就很难保证外语教材内容、语言、插图不出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上述管理流程既可以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又可提高编写工作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 3. 结语

教材是国家事权,要体现国家意志。中国教材的意识形态性有一段时间未得到充分重视。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教材编写工作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做到“凡编必审”。外语教材编写也不例外。本文报告的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构建而成。我遵循的是《实践论》(毛泽东 1971)的基本原则,即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反复循环,不断优化。目前这一理论仍处于初创期。我会继续努力,对其进行修订与完善。我也期待更多的外语教材编写者参与到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建构中来。中国外语教材编写的数量之多,发行量之广,影响面之大,可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在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上也应走在世界前列。

#### 参考文献:

- [1] Levelt, W. J. M.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2] Schmidt, H. J. *The Dynamic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3] UNESCO. *Cultural Diversity: Common heritage, plural identities* [OL]. Paris: UNESCO, 2002. [2023-03-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27161?posInSet=1&queryId=137b2b3b-2cba-4cd8-8d82-476258044b08>
- [4] Wen, Q. F. Teaching culture(s)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sia: Dilemma and solution [J].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2016, 5 (1): 155-177.

- [5] Greenall, 文秋芳. 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1-4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a.
- [6] Greenall, 文秋芳.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1-4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b.
- [7] Greenall, 文秋芳.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视听说教程(1-4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a.
- [8] Greenall, 文秋芳.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综合教程(1-4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b.
- [9] Greenall, 文秋芳.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1-4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 [10]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5版)[M]. 讨论稿(未正式出版), 2015.
- [11]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 [12] 李筱菊. 浅谈外语教学的交际教学法[J]. 现代外语, 1984, (1): 18-23.
- [13] 李筱菊. 交际英语教程核心课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 [14] 毛泽东.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C] // 毛泽东. 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1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8年修订)[OL]. 2018. [2023-03-20].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1/9df07167324c4a34bf6c44700fafa753.shtml>
- [16] 唐磊. 外语教材编制理论初探[J]. 课程·教材·教法, 2000, (12): 22-31.
- [17] 王守仁, 文秋芳. 新一代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第2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18] 文秋芳, 杨华. 新标准职业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1-4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 [19] 文秋芳. 高级英语口语教程(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20] 文秋芳. 高级英语口语教程(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a.
- [21] 文秋芳. 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2] 文秋芳. 跨文化口语教程[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b.
- [23] 文秋芳. 新中国外语教学理论70年发展历程[J]. 中国外语, 2019, (5): 14-22.
- [2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5] 夏纪林. 不同年级大学生主要心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5, (3): 42-45.
- [26] 曾天山. 教育科学新探索书系: 教材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 [27] 张劲. 心理轨迹的探索——大学生心理成长阶段的特点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2): 118-125.
- [28] 庄智象.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和评价体系[J]. 外语界, 2006, (6): 49-56.

**基金项目:**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研究”(22JJD740011)

**收稿日期:** 2023-09-20

**作者简介:** 文秋芳, 女, 镇江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外语教育、外语教材编写、国家语言能力。